

侯景之乱： 南京历史上一场原可避免的浩劫

胡晓明



在中国六大古都中,南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城市,粗略数一下,自孙吴建都以来至于民国,南京遭遇严重的战火摧残不下七八次。在古代,南京遭到最为严重的一次灾难无疑是发生在南朝萧梁末年的侯景之乱。这场叛乱,不仅颠覆了一个王朝,也在南京城市史上留下了一个极为惨痛的印记。

一、侯景之乱的经过

1. 引狼入室

公元534年与梁朝对立的北魏王朝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政权控制在权臣高欢手中,侯景即是高欢手下最重要的将领之一。547年正月高欢病死,世子高澄接替了其父亲的权力。侯景因与高澄不和,于是叛归西魏。侯景为人狡诈多端,反复无常,西魏对他的归附并不信任。所以不久侯景又遣使致书梁朝皇帝萧衍,请求以所控制的荆、襄等十三州归附。梁武帝采纳大臣朱异的建议,接受了侯景的请降,并封他为河南王。同年三

月,梁武帝命令司州刺史羊鸦仁等率兵3万赶赴悬瓠(今河南汝南)运粮以接应侯景。

东魏在得知侯景叛变的消息后,遂派大军前来镇压。由于梁朝援军尚未赶到,侯景又以割地为条件,向西魏求援,然而不久又叛西魏。对于侯景首鼠于西魏和梁之间的举动,梁武帝竟不以为意,并于当年八月派遣萧渊明等人大举进攻东魏,接应侯景,但被东魏大将慕容绍宗打得大败。随后,慕容绍宗在涡河附近全歼侯景的军队,侯景仅率数骑渡过淮河得以逃脱,沿途收容散兵800余人,逃奔梁朝控制下的寿阳城(今安徽寿县)。

2. 起兵乱梁

侯景兵败只身来归,梁武帝不仅不以为嫌,反而任命他为南豫州牧,镇守寿阳。而东魏在取得胜利之后,又主动请和于梁朝以离间梁武帝与侯景之间的关系。侯景对东魏与梁媾和之事极力反对,在稍做准备之后,便于548年8月在寿阳起兵叛梁。侯景在起兵之前,曾秘密联

系了梁朝的临贺王萧正德,与之暗下结盟以作为内应。十月,侯景率1000余人突然袭向建康,并利用梁朝军队换防的间隙,在采石(今安徽马鞍山)顺利渡江,挥兵直指建康朱雀桁(今江苏南京南),梁朝守军一触即溃,萧正德的党羽协助叛军渡过朱雀桁,从宣阳门攻进建康城,将梁武帝紧紧围困于台城之中。所幸台城十分坚固,再加上守将羊侃防守得当,叛军久攻不下。台城虽然没有攻下来,但是叛军却先后击败了建康城外的十多万援军。549年3月,侯景引玄武湖水以灌台城,并从四面发动猛攻,台城在被围攻半年之久后最终陷落。侯景于是挟持梁武帝及太子,遣散城外援军,控制了梁朝的军政大权。

3. 萧绎平叛

萧绎(即后来的梁元帝)是梁武帝第七子,被封为湘东王。侯景叛乱时,他作为镇西将军、荆州刺史手握重兵,镇守在江陵(今湖北境内)。549年5月,梁武帝饿死于台城净居殿,太子萧

纲即位,即是简文帝。萧绎在侯景攻陷建康,围困台城的时候,不仅没有派兵救援都城建康,反而与其两个侄子岳阳王萧誉及河东王萧誉兄弟(昭明太子萧统之子)大战于长江中游地区。一直到公元550年5月,萧绎军队在攻下长沙,杀死萧誉之后,萧绎才给他的父亲武帝发丧,并下令举军讨伐侯景。萧绎大军在王僧辩率领下顺江东下,于552年2月在寻阳与赶来的陈霸先(即后来的陈武帝)军队汇合。次月,王僧辩与陈霸先的联军在姑孰与侯景大将侯子鉴进行决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当侯景听到兵败消息后,“大惧,涕下覆面,因衾而卧,良久方起,叹曰:‘误杀乃公!’”此后,侯景孤注一掷,又与王僧辩的军队战于建康石头城北,侯景再次大败。失败之后的侯景连台城也来不及进,携其二子仓皇南逃,到松江时被追军追及,只得与心腹数十人乘船准备东入大海,随船的部将羊鲲、谢葳蕤在一个叫胡豆洲(今江苏南通一带)的地方将他杀死。至此,这场首尾长达五年的叛乱终告平息。

二、一场原可避免的浩劫

侯景攻下台城,见到梁武帝,二人有段有意思的对话。武帝问侯景:“初渡江有几人?”侯景回答说:“千人。”武帝再问:“围台城几人?”回答说:“十万。”又问:“今有几人?”回答说:“率土之内,莫非已有。”侯景以区区一千余人,在毫无后方支援的情况下,利用掩袭的方法,直捣梁朝的首都,这样的冒险行动居然成功,这对侯景来说简直是奇迹,而对梁武帝来说则近于荒唐。

就是这场近于荒唐的叛乱,不仅给萧梁政权致命的打击,而且也给建康城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史书上说:“自景围建康,城中多有肿兵,死者相继……自云龙、神虎门外,横尸重沓,血汁漂流,无复行路。及景入城,悉聚尸焚之,烟气张天,臭闻十里。”台城刚被围困时,城中兵民有十万之众,及城破之时,只剩下两三千人。同时,叛军和后来平叛的萧绎军队的残暴也加重了灾难。侯景在攻进建康之初,尚对军队有所约束,当久攻台城不下时,由于军队粮食缺乏,于是放任士兵抢掠,直至后来掠人作食。王僧辩在攻进建康后,也放纵士兵大肆抢劫,甚至连人们的衣服都扒了下来,“男女裸露,自石头城至于东城,号泣满道。”人员死伤如此之重,城市建筑也未能幸免。在侯景进攻台城期间,众多建筑或被拆毁,或被付之一炬,以至在叛乱期间百济国前来建康的使者,见到城市荒颓也不禁失声痛哭。后来王僧辩的军队攻进建康后,也因军士夜中失火,将台城内的主要建筑几乎烧毁。侯景之乱,实实在在是古代南京史上的一场浩劫。

只有千余人的叛军竟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这与其说是侯景的残暴所致,倒不如说是梁朝统治者自食其果。从侯景归降,到起兵反叛,再到叛乱的平息,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梁朝统治者犯了许多低级而致命的错误,不仅在纳降侯景的决策上过于轻率,而且在纳降后还疏于防范,甚至纵容迁就。另外,梁内部的争权夺利则使得叛乱不能及早平息,从而加剧了灾难。如果不是

以上因素,这场浩劫是可以避免的,即使发生,也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1. 为利所惑,轻率决策

梁武帝在接纳侯景投降之前,已与东魏议和通好,所以对接纳东魏叛臣侯景之事,梁朝君臣在廷议时大多数人表示反对。梁武帝自己也颇费思量,常私下问自己说:“我国家如金瓯,无一伤缺,今忽受景地,诘是事宜?脱致纷纭,悔之何及?”武帝还做了一个梦,梦见东魏中原地区的地方长官皆来献地投降。他于是把梦的情形告诉了中书舍人朱异,并说他很少做梦,可一旦做梦必然是真的。朱异是个专以迎合皇帝之意而得宠幸的佞臣,他劝武帝说:“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来,自非天诱其衷,人赞其谋,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纳,恐绝后来之望。此诚易见,愿陛下无疑。”朱异的话一下子说到了梁武帝的心坎上,于是做了最终决定。在今天看来,梁武帝所做的梦,正是他觊觎侯景所控制的黄河以南大片土地心理的强烈反映,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要紧的是他将梦当真了,竟以所梦为理由,做出纳降侯景的最终决定。后来,侯景在被东魏军队打得大败,仅带800人逃奔寿阳之后,梁朝的光禄大夫萧介再次劝谏梁武帝,说侯景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且是只身来投,建议武帝不要接纳,但是梁武帝仍然置之不理。

其实,对于接纳侯景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不仅梁武帝周围的一些大臣看得清楚,而且东魏和西魏都有人指出此举是自引祸水。但是梁武帝置别人的告诫于



不顾,以一梦为由而接纳侯景,由此埋下了祸根。

2. 疏于防范,纵容迁就

梁武帝虽然答应了侯景的请降,但是如果在后来对他有所防范,势单力孤的侯景即使发动叛乱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受降如受敌,这本是政治家的常识,偏偏梁武帝忽略了这一点,对归降后的侯景疏于防范,甚至刻意纵容迁就,终于铸成大错。

侯景逃奔寿阳后不久,东魏与梁朝再次议和通好,侯景知道后十分不安,他先是上书劝武帝不要与东魏通好,后见武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便由不安转为不满,并且将他的不满日益表露在他给梁武帝上书的言辞中。同时侯景还暗下做叛乱的准备,不仅不断向梁武帝索求军资,而且还联络上对梁武帝怀有怨恨的临贺王萧正德。侯景这些作为,并不是没有人知道,先是侯景身边有个叫元贞的人知道侯景即将反叛,十分害怕,于是逃回建康告密。后来侯景又派使者劝梁朝大将羊鸦仁与之同反,羊鸦仁将使


者抓住送到建康,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武帝不但不追查,反而把使者放走。于是侯景更加肆无忌惮,竟然上书恐吓武帝,说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就要率领军队“临江上,向闽、越”,反形已昭然若揭。即便如此,武帝却自谴说:“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朕之失也。”

武帝的纵容迁就,不但没有改变侯景叛乱的决定,反而加速了发动叛乱的进程。548年8月侯景反于寿阳。梁武帝知道消息后,仍然不以为意,笑着说:“是何能为!吾执箠答之。”当侯景军队掩袭到长江附近,谍报不断将敌情传到建康时,武帝于是问都官尚书羊侃讨伐侯景的策略。羊侃建议立即派遣两千人防守长江重要渡口采石,并令邵陵王萧纶攻取寿阳,使得侯景进不得前,退无后路。但是武帝又听信朱异“景必无渡江之志”的昏话,没有采纳这一正确而又事关存亡的建议。正是如此,侯景得以顺利从采石渡江,局势由此而不可收拾。

3. 内部纷争,加剧灾难

侯景攻进建康后,由于台城坚固,防守严密,叛军久攻不下。这时四面援军十多万人陆续赶来。但是援军将领因为争夺主帅之位,人心不一,配合失利,549年正月建康城外青塘一战失利后,援军再也不敢出战,而是在城外与城中的叛军对峙。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十分奇怪的战场态势:城中的叛军围攻台城不止,而城外的援军却翘足观望以看热闹。

更有甚者,梁武帝的儿子萧绎及孙子萧誉、萧誉皆重兵在握,镇守在长江中游。他们在听到建康被攻陷的消息后,虽然口头上声称赴援,但是始终按兵不进。萧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想等叛军攻陷台城,父兄死亡后,他好继承大统。萧绎虽然不援救建康,但他也没有闲着,而是与其两个侄子萧誉、萧誉兄弟激战于长江中游地区。梁武帝子孙之间的争权夺利,极大地延长了叛乱的时间,从而加剧了这场叛乱造成的灾难。

纵观东晋南朝整个历史阶段,萧衍统治下的梁政权,在其中前期,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发展很快。国家承平日久,不仅社会风气日渐浮华,武备也十分松弛。所以经侯景一乱,本已得到很大发展的江南社会几乎毁于一旦。由此可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的名言岂是虚语! 

[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古时期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瑞应及其宗教意义研究”(14BZJ012)中间成果]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彭安玉